

马来亚 华人的抗日运动

陈剑著

策略资讯研究中心出版

马来亚 华人的抗日运动

陈剑

马来亚 华人的抗日运动

作者：陈剑

出版：策略资讯研究中心

发行：文运企业
Gerakbudaya Enterprise
11, Lorong 11/4E,
4620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gerakbudaya@pd.jaring.my

印刷：Vinlin Press Sdn. Bhd.

出版日期：2004 年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21.67

目录

3 前言

5 一、日本侵华与南洋华人的反应

5 血缘纽带，故国情怀

8 抗日筹赈运动

13 华人左右派的矛盾

15 二、日军侵占马来亚华人的反应

16 星洲华侨抗敌动员总会

18 星华义勇军

21 三、日军政对待马来亚华人的政策

21 日军政马来亚华侨政策是日本对华政策的延续

23 检证大屠杀

24 五千万元“奉纳金”

26 经济垄断政策

30 四、日治时期沦陷区人民的处境

30 移殖区与“勤劳奉仕”增产运动

33 奴化教育与“日本化”运动

34 铁蹄下的生活掠影

36 五、华人的抗日运动

37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成立

41 人民抗日军的编制

47 日本侵马与马共斗争纲领的改变

54 在战斗中成长

59 与联军 136 部队的合作

61 美罗协议与马共八大主张

65 结论

马来亚华人的抗日运动

前言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日起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止，这三年零八个月是新加坡、马来西亚（时两地合称为马来亚）史上的沦陷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后，节节胜利，在短短二个多月，以四万八千兵员便打败了号称十万大军、拥有东方直布罗陀军事堡垒的英殖民政府，取而代之统治马来亚，给马来亚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马来亚沦陷后，日军政施行暴政，罪行累累，罄竹难书，时为新马史上一段最黑暗的时期。

这场战争以及日本军政三年零八个月的严酷统治带给新马华人什么影响呢？许多学者都曾就这个课题进行过研讨。最重要和显著的影响应是华人在政治上的进一步觉醒，特别在政治认同上重大的转变形成对新马政治的冲击，华人从最初协助中国抗日发展到必须拿起枪杆为所居留的土地而战，华人的政治意识亦普遍地从侨民意识转化为“当家作主”，

而不仅仅是马来亚共产党人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至的结果是引发了全世界殖民地的民族民主解放斗争。马来亚华人经历了抵抗日本南侵，之后组织了许多的游击队并逐渐由马共领导建立了较有组织和规模的人民抗日军，继续与日本顽抗。沦陷区内人民则遭受残酷的镇压欺凌、迫害、侮辱、压榨以及种种残绝人寰的杀害。不论是辗转于森林之中，还是处于日军政府的刀尖下，华人在时代的感召下，逐步从效忠中国、心怀故土的情怀中解脱出来，萌生了与当地人民共存亡的较现实的政治思想。马来亚共产党于1932年便提出了打倒英帝并建立“马来亚工农苏维埃共和国”的革命纲领^①，于1939年4月中央执委会会议上，鉴于太平洋战争即将爆发的形势，马共政治策略从1932年的纲领淡化而号召建立各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民主制度，保卫马来亚和平安全，不再提打倒英帝国主义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口号。这策略具体化为十大斗争纲领^②。1940年2月，国际形势日益恶化，马共中央执委会便又按新环境的需要而放弃了此十大纲领而代之以新的十大纲领。马共又于1941年12月10日第七届扩大会议第2次中央执委会上，再提出“两大任务和三大口号”，正式提出“抗日卫马”、“团结及动员全民力量，成为英政府抗战后盾，打倒日本法西斯蒂”等斗争纲领，并在1942年5月马来亚沦陷后于马共三次中央执委会上确立了“抗日九大纲领”^③。这九大纲领又确立了“驱逐日本法西斯出马来亚，建立马来亚民主

① 《南岛之春》（新加坡马来亚出版社1946）页9。

② 同上书，页13-14。

③ 同上书，页26-27。

共和国”的政治目标。马共是当时华人的一个最主要政党，也最具“马来亚倾向”的政治意识。从上述其斗争纲领因国际及马来亚战争及政治形势的转变而改变但其立意要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鲜明本土意识说明其政治实践具有“落地生根”的积极意义。

由于日治时期华人分别处于游击区的战斗生活和陷于沦陷区的水深火热的生活，本文将就下列各方面讨论日治时期华人的情况、变化和发展：

- (一) 日本侵华与南洋华人的反应
- (二) 日军侵占马来亚华人的反应
- (三) 日军政对待马来亚华人的政策
- (四) 日治时期沦陷区华人的处境
- (五) 马来亚华人的抗日运动

一、日本侵华与南洋华人的反应

血缘纽带，故国情怀

从新马开埠华人南来至 1941 年 12 月日军南侵前，新马华人除极少数外，在政治上、情感上都一律以中国为依归。中国为祖国，马来亚为谋生或避难移居之地。华人移民的侨民意识十分浓厚。他们对中国的政局，家乡的情况一律十分重视和关怀。许多从事政治或文化的工作者仍然受命于中国政府或中国的机构。无论是国民政府及其执政的国民党或者是当时仍然在野的中国共产党都在马来亚设立其分支机构，委派专员专司所谓侨民事务或设立其南洋支部

组织工运等等^④。目的仍是团结马来亚华人争取支持并获取经济捐输支援在中国的经政运动和项目。即使当时土生的第二代华人亦不例外。英殖民政府亦把所有华人当作是中国侨民看待。因此，中国大陆发生的政治事件对马来亚华人亦产生重大影响。马来亚华人对之发表议论和见解，慷慨激昂表态支持或反对，采积极参与的姿态。英殖民政府对此一律采取镇压手段。对 1930 年代及 40 年代十分活跃的国民党人（不论左派或右派）以及中共南洋支部或后来的马来亚共产党人及其外围组织都采取严厉的管制、打击甚至于逮捕、封禁和驱逐的措施^⑤。

马来亚华人移民与其原住地闽粤等中国省份的亲人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这种血缘纽带，使他们维持着紧密的情感、道义、利害的连系，因此对于祖国发生的一切都身同感受，体会与共。中国的社会运动与马来亚的社会运动因此相互呼应，相互影响。马来亚华人始于中日甲午战争便已产生抗日援华的反应。1915 年袁世凯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更强烈地引起马来亚华人不仅在报章为文表态，谴责日本侵略，更纷纷在马来亚各处展开反日、抵制

④ 崔贵强《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 1945—1959》（厦门大学出版社 1989），页 25-27；Cheah Boon Kheng, *Red Star Over Malaya*, 2nd Edition,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56-57。

⑤ 崔贵强《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 1945—1957》（厦门大学出版社 1989）页 29。

日货运动。1919年五四运动亦对马来亚华人社会产生重大影响，使华人在抗日援华的运动进入另一阶段。马来亚多处地区青年学生和工人组织反日示威游行、捣毁日货^⑥。1928年5月3日“济南惨案”使马来亚华人群情激忿。陈嘉庚等商界巨擘于5月17日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召开声讨日本军阀大会并同时发起成立“山东惨案筹赈会”^⑦，号召华人慷慨捐输达134万元赈济国难。这应是新马史上全体华人首次大规模行动的抗日援华救国运动。当时参与赈济运动的人数单以新加坡计便达10万人之众。此次的赈济运动为后来的抗日援华运动奠定了模式和基础。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三省沦陷。在短短的数日内，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便召开紧急会议，通电国民政府要求抗日并致电国际联盟和美国，要求国际方面制止日本侵略^⑧。马来亚报章一如既往，大量发表抗日文章，谴责日帝侵华罪行，学生上街游行示威，进行抗日、抵制日货宣传。各界亦纷纷设立筹赈组织，进行募捐活动。1932年12月11日，马来亚共产党进一步领导群众展开大规模示威游行，除抗日援华外，倘兼及对英殖民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及谴责其无能解决“经济大恐慌”所造成的民生问题^⑨。至此，马来亚华人

⑥ 余梅《中华总商会年谱纪略》载《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庆祝钻禧纪念特刊》（1966）页177。

⑦ 《叻报》，（新加坡）1919年7月7日。

⑧ 《南洋商报》，（新加坡）1931年10月1日。

⑨ 陈刚父《从星洲事件说到南洋社会的不安》载《南洋情报》第一卷第五期页172-173转引自黄枝连著《东南亚华族社会发展论》（上海社会科学院1992）页38。

在抗日援华的运动方面已进入崭新的局面，掀起又一个高潮，华人社会各方面都广泛被发动起来，投入抗日援华的队伍。

抗日筹赈运动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升级，马来亚华人的抗日援华运动亦更为提升。当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抗日援华运动便发展至最高阶段。同年7月13日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召开讨论抗战情势会议，7月15日与各宗乡会馆商研支援抗日具体步骤。7月16日柔佛州麻坡首先成立华北难民筹赈会，7月18日柔佛州华侨救济祖国难民总会正式成立^⑩。8月9日起，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发起抵制日货运动。8月15日118个华人社团一千多名代表于新加坡中华总商会通过成立“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后简称为“筹赈会”，公推陈嘉庚为主席，由各帮派委任32位代表组成。接着，全马各地纷纷成立筹赈会，共达207个之多^⑪。10月10日马来亚各筹赈会代表齐集吉隆坡举行大会，成立“马来亚各区华侨筹赈会联合通讯处”，陈嘉庚再被委为主席。全马并分十二区，各城镇、乡村亦都设有

^⑩ 许云樵、蔡史君编《新马华人抗日史料1937—1945》（新加坡文史出版私人有限公司1984）页74。

^⑪ 同上书，页4；杨建成编《南洋华侨抗日救国运动始末1937—1942》（台北中华学术论南洋研究社1983）页11。

筹赈会分部或募捐站^⑫。华人社会几乎全民动员，采取多姿多采的内容与方式进行募捐运动。在吉隆坡成立的“通讯处”，目的在于统筹筹赈的活动。1938年10月10日更联合印尼、泰国、缅甸、菲律宾、越南、香港等43地区168名代表成立“南洋华侨筹赈总会”。筹赈总会设于新加坡，“通讯处”于“总会”成立三个月后始正式撤消^⑬。“总会”的成立使抗日援华的行动步骤统一，发挥华社团结的强大力量，抵制日货的声势浩大，抗日反日情绪高昂。英殖民政府此时尚对日本侵华战争抱持观望态度，对马来亚华人的抗日筹赈运动采取阻挡、禁止的措施。不准华社组织筹赈募捐活动，亦禁止汇款接济中国政府支持抗战。例如1937年中华总商会原订于7月24日举行的118社团大会便因英殖民政府出面阻止而流产，而后至8月15日始成功召开。时英殖民政府对日益活跃的国民党激进份子、中共及马共活动份子采取更严厉的镇压手段，动辄逮捕，控诸法庭并递解出境至中国。较著名者如曾领导煤炭山大罢工的赤色总工会主席陈石（于1937年4月被捕12月递解出境）、马共马六甲地委书记，马共中央委员何英（于1935年遭逮捕，1936年递解出境）。尽管如此，华社不屈服于英殖民政府的管制，仍然动员起来进行如火如荼的抗日援华

⑫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新加坡南洋印刷社1946）页44-45。

⑬ 许云樵、蔡史君编《新马华人抗日史料1937—1945》（新加坡文史出版私人有限公司1984）页6；杨建成编前书页114-115。

运动。马来亚筹赈会当时议决筹足1千万元叻币，新加坡负责三百万元^⑭。富商叶玉堆率先响应捐输10万国币（约折2.5万叻币），李光前及其橡胶公司捐20万国币（约折5万叻币），时捐万元者众多。陈嘉庚、陈六使等则以常月捐方式认捐，每月捐5千元直至抗战胜利为止^⑮。除一次性现金捐输或常月捐外，尚有从货物价格中抽取的货物助赈特别捐，例如橡胶每担抽取一角、米糖、木材等计每月可得八至十万元之数^⑯。其他特别捐如纪念日劝捐、卖花卖物等义卖活动、义演、义赛、酬神节约、义舞、货物报效等捐输方式不胜枚举。从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16日的统计看，全马华人共捐得叻币四千四百万元，其中新加坡占一千四百万元。南洋各地共捐得叻币一亿二千多万元。此外尚认购中国发行的债卷，计全马认购三千两百多万元，连同捐款共达八千三百多万元，南洋各地认购公债五千四百多万元，连同捐款则达一亿七千多万元^⑰。以当时的物价言，这是一个庞大的数目，足以展示华社集体的力量。后来日本军政府逼使马来亚华社缴交五千万元“奉纳金”，除了当时急需军费外，或许也是对华社抗日援华的

⑭ 同注⑬。

⑮ 许云樵、蔡史君编：前书5页；杨进发：《战前的陈嘉庚言论史料与分析》（新加坡南洋学会1980）页115。

⑯ 许云樵蔡史君编：前书页5。

⑰ Stephen Leong, *The Malayan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1*；李思涵《星马华人的抗日救亡运动》载李思涵《日本军战争暴行之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94）页279-284。

一种恶性反应。从华社捐输的数目看，也是使日军政府对华社的财富实力深为重视，甚至估计过高。此次的筹赈运动政治意味较浓厚，涉及面十分深广，是东南亚华社的全面总动员，社会各阶层均介入，南洋筹赈总会统筹整体工作，各地区筹赈会具体运作。在马来亚，马来亚共产党积极领导群众——主要是学生和工人阶级，配合由以陈嘉庚为首的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整个筹赈运动。这个运动可以说是反帝反殖运动与抗日援华运动相结合，是前所未有亦是此后不曾再度发生的，各阶层和各阶级为着共同的敌人和援助中国抗战以及反法西斯联盟的政治运动。这个运动也暂时缓和了当时华社内部长期存在的各种政治和社会矛盾。诸如国共两党意识形态的斗争体现在新马的国民党左右两派的斗争、国民党右派以及民族资产阶级与中共连同马共之间的斗争，人民与私会党之间的斗争，华社内部的帮派斗争等等。这种因外辱消弭争端、同仇敌气、共同抗日、一致对外取得华社大团结应是新马史上空前的一个十分特殊但却深具意义的现象。筹赈运动基本上是一个群众运动。除了有个义正词严堂正的筹赈理由外，宣传发动群众参与是运动能够广泛深入及成功的因素。马来亚共产党于1930年成立之后，虽屡遭英殖民政府的打击却仍然强劲地生存和发展着，抗日援华正提供了马共一个良好发展的时机。马共一直自任是抗日运动的先锋队，积极组织群众，发动群众投入整个运动中去，这次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使群众运动发挥起最具建设性的作用。当时由马共组织的强大外围抗日组织“马来亚华侨各界抗敌后援会”（简称“抗援会”）及由中共在新人员组织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

队南洋总队部”（简称“民先队”）最具影响，前者会员人数超过3万名，是筹赈运动的群众骨干。此外尚有“劳工锄奸团”、“新加坡抗敌除奸义勇队”、“抗敌救国锄奸团”、“海外华侨抗敌救国会”、“新加坡华侨救国服务队”、“青年救国同盟”、“中华抗日锄奸铁血团”、“中华抗敌便衣队”、“中华劳工抗日救国团”、“中华民族复兴团”、“锄奸别动队”、“马来亚救亡锄奸团”等等群众团体^⑮。这些团体进行反日、抗日、抵制日货等活动并处罚售卖日货商人。仅1938年，就有600多家商店遭涂乌油或丢臭蛋，25人被割掉耳朵30人遭暗杀。当时亦产生零星的骚扰日本学童、殴打日本侨民的事件^⑯。

除了轰轰烈烈的筹赈运动之外，马来亚华人在欧战爆发之后，已把抗日运动扩大到反法西斯、反侵略运动。1939年，马来亚华人亦发动赈济英国反德侵略，曾两度慷慨捐输37万5千磅及57万5千磅，共95万磅^⑰。在世界经济萧条，失业情况严重，濒临战争浩劫、生活困苦的情况下，马来亚华人仍倾囊相助，显示了华人大公无私仗义的胸怀。

此外，重庆国民政府亦电求南侨总会代为招募驾车机

⑮ 杨建成：前书17-19、34-35页；杨进发《战前星华社会结构与领导层初探》（新加坡南洋学会1977）页71-73。

⑯ Yoji Akashi: *The Nanyang Chinese Salvation Movement 1937-1941*。

⑰ Victor Purcell,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2nd Edition*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304-305。

工并派宋子良前来面商此事。在陈嘉庚号召下，3千2百多人便分九批出发前往中国战区服务。这些归国机工抛妻弃子，满腔热血在前线枪林弹雨中奔驰，半数以上牺牲于战场之中，伤残者后来竟不获国民政府照顾而流落昆明街头，乞食为生^②。

华人左右派的矛盾与合作

民族资产阶级及国民党人与左翼人士及马共党人在抗日大前提下的合作也因阶级利益的冲突形成多重的矛盾。例如筹赈会诸公不愿看到带有强烈左翼色彩和反英的群众运动、罢工和街头示威。工人和学生运动声势浩大并壮大了筹赈运动但却担心其强烈的政治影响。他们虽然拥有抗日援华运动的领导权，但却掌握不住群众和文化抗日运动的大权，他们深恐马共势力的膨胀，但却无能为力。这种矛盾渐渐表面化而终通过报章辩论和协商达致共识。1938年7月30日南洋商报“华侨团结救亡问题专号”里，代表左翼的叶尼、洪涛、压之、英浪等集体执笔发表《我们的态度》及代表资产阶级的庄惠泉、林谋盛、王吉士等均发表《华侨团结救亡的几个基本原则和建议》。双方都表明立场，以取得统一运动的步骤，化解双方的矛盾。马共亦在“一切服从抗日”“抗日高于一切”的大前提和原则下，一改

② 许云樵、蔡史君等编：前书页7；刘牡丹：《沉痛的回忆》载《南侨复员机工互助会12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1959）页9-11。

前此的罢工斗争方式，而以和平谈判来解决劳资问题。1937年，新马罢工次数高达1094次，参加罢工人数达8040人，是三十年代罢工次数达致最高点的一年^②。七七事变后，由于马共斗争策略的改变，罢工次数减少。然而由于英殖民地主义的无能和经济大萧条引发的社会矛盾深化，马来亚华社两极化扩大，阶级对抗更形恶化。民族资产阶级中的右派要求马共取消斗争，解散各类团体，但马共及左派则认为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团结一切力量是壮大抗日援华队伍的唯一途径。1938年末，中国国民党右派在武汉沦陷后，发动对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并进攻中共的军队和解放区，袭击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后方机关，杀害干部、战士和共产党人达千人之多。掀起反共高潮并持续排共、反共运动。这股反共潮流亦恶化了马来亚左右派的斗争。于1940年中，陈嘉庚不顾劝告而前访延安因而激怒重庆国民政府。于是，国民政府派出其海外部长吴铁城于1940年9月在南洋联同当地右派推动反共倒陈运动^③。至此，华社的民族资产阶级中的左右派产生分裂。但倒陈运动不曾得逞。在较后举行的南侨总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各党派人士一致拥护并挽留陈嘉庚为南侨总会主席，并于1941年4月4日发表《南洋各属闽侨代表大会宣言》强烈反击吴铁

② 黄枝连：《东南亚华族社会发展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页85。

③ 黄枝连：前书页173-178，页181-183。